

中國全史大系 第三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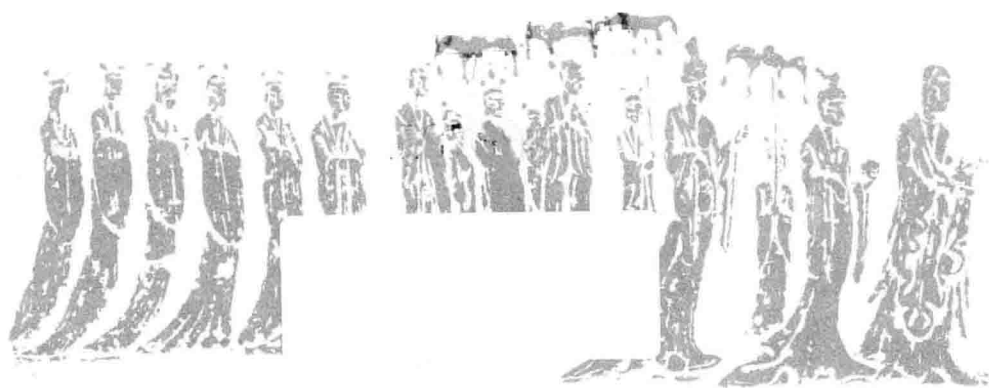
中國通史

光明日報出版社

中国全史大系

中国通史

第三卷



光明日报出版社

大德五年(1139),崇宗死,子李仁孝(西夏仁宗)即位。仁宗母曹氏,汉人。仁宗十分重视儒学教育。大庆四年(1143),下令各州普遍设置学校。又在宫廷内设立皇家学校,七岁至十五岁的宗室子弟都必须入学学习。尊孔子为文宣皇帝,令州群兴修孔庙。大庆五年(1148),又兴建内学,选名儒主持讲授。仁宗妻罔氏,出身党项大族,也好汉礼。大庆四年,仁宗依仿宋朝科举制,策试举人,立唱名法;又设立童子科。通过科举擢用官员,限制了贵族的特权。

蕃部起义与任得敬篡国的失败

西夏仁宗李仁孝统治时期,贵族、官僚都以奢侈相尚,对百姓的诛求克剥越来越重。官员、军队人数激增,僧徒遍布境内,大庆元年,夏州统军萧合达叛乱,以复兴辽朝相号召,遣兵四出略地,游骑直逼贺兰山,都城震动。这次战乱虽然被静州统军任得敬平定,但对夏国腹心地区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三年,饥荒四起,升米百钱。四年,兴庆府、夏州一带发生强烈地震,人畜死亡万数。地震加重了饥荒,人民纷起暴动。威州的大斌,静州的埋庆,定州的筰浪、富儿等蕃部,多者万人,少者五六千,所在结集,攻城掠邑。州将出兵镇压,都被起义者所败。起义终于被西平府都统军任得敬所剿灭。

任得敬原是宋西安州通判,降夏后献女为崇宗妃(后正位为皇后)。他以后戚而镇压反乱有功,官位迅速上升。他通过贿赂得为尚书令,升中书令,后居国相高位,独揽朝权。弟得聪为殿前太尉,得恭为兴庆府尹,族弟得仁为南院宣徽使,侄纯忠为枢密副都承旨。任得敬受封为楚王。乾祐元年(1170),他公然胁迫仁宗“分国”,要求以夏国之半归他统治。仁宗无奈将西南路及西平府、罗庞岭一带划作楚王的直辖封疆;并遣使奏报金国,代任得敬请求册封。金世宗不允。任得敬因此怨金而阴谋附宋自立。在金国的支持下,仁宗令弟仁友等捕杀任得敬,尽诛任氏族党,改任著名儒学家韩道冲主持国政。乾祐二十四年,仁宗死,子李纯祐(西夏桓宗)嗣位。

夏的灭亡

13世纪初,蒙古在漠北兴起。成吉思汗在统一蒙古草原诸部的同时,开始向外扩张。天庆十二年(1205),侵夏,陷力吉里寨;经落思城时,大掠人畜。蒙古兵退走后,桓宗下令修复各地残破的城堡,大赦境内,改都城兴庆府为中兴府。应天元年(1206),镇夷郡王李安全废黜桓宗,自立为帝(西夏襄宗)。其年秋,成吉思汗再次侵夏,破斡罗孩(兀刺海)。次年二月北撤。

应天四年,成吉思汗第三次侵夏,出黑水城北,趋斡罗孩关口。襄宗以皇子承祜为元帅,大都督府主高逸为副,率兵抵抗,大败,高逸被俘杀。蒙古军进逼中兴府的外围要隘克夷门。襄宗任嵬名令公率军增援,兵败被俘。蒙古军进围中兴府,引黄河水灌城。城将破,适外堤崩决,反淹蒙古军,迫使解围。襄宗纳女请降。襄宗附蒙攻金,双方迭起兵争。光定元年(1211),宗室齐王李遵顼废襄宗自立(西夏神宗)。

光定六年,成吉思汗开始集军图远征中亚,屡向夏国征兵,夏不堪其苦,表示拒绝。于是又招致蒙古军第四次来侵,东京中兴府被围。神宗匆忙逃往西京西平府,留太子李德任防守都城,再次向蒙古请降。蒙古军退后,神宗图联合抗蒙,金国不许,又图结宋攻金,朝中意见纷纭。光定十三年,神宗派李德任率兵侵金。李德任主张联金,拒绝受命。神宗废德任,随即以皇位付次子李德旺,自称太上皇。李德旺(西夏献宗)即位后,力主抗蒙。乾定二年(1224),蒙古国王勃鲁攻银州,夏军损失惨重,献宗遣使与



金议和，相约为兄弟之国，以图自保。

乾定四年，成吉思汗亲率大军攻夏。分兵两路：一路自畏兀儿境东进，攻取沙、肃、甘诸州，直逼西凉府；另一路由成吉思汗亲率，从漠北南下，下黑水、斡罗孩诸城，进至贺兰山。七月，成吉思汗与西路军会合，陷西凉府。献宗惊忧致死，侄南平王李睨（末帝）继立。蒙古军穿越沙陀，下应理（今宁夏中卫）等县。十一月，夺取灵州后，进围中兴府。宝义二年（1227）初，成吉思汗留蒙古军一部继续攻城，他本人南下克积石州，进掠金朝州郡；六月，避暑六盘山。中兴府被围半年，粮尽援绝，末帝遣使乞降。他请求成吉思汗展限一月，然后亲往朝觐。七月，成吉思汗病死军中。末帝在赴降时被执杀。蒙古军陷中兴府，夏亡。

三、夏国的制度

行政组织

唐末、五代以来，拓跋（李）氏统治者既是诸蕃落的首领，又受封为节度使。因此夏州政权设有州衙和蕃落两种行政机构。州衙所治，限于四州八县蕃汉杂居之地；其余广大地区的蕃部，则由兼领的押蕃落使统治。蕃部居民多聚族而居，一家叫作一帐。小族数百帐，大族千余帐，各有首领，沿旧俗而治，附属于夏州政权，而又拥有相当的独立性。

1033年，元昊仿宋朝制度设官分职。包括中书（最高行政机关）、枢密（最高军事机关）、三司（财政机关）、御使台（监察机关）、开封府（管理都城事务）、翊卫司（掌宿卫）、官计司（掌任免官吏）、受纳司（掌仓储收支）、农田司（掌农田水利）、群牧司（掌饲养马匹）、飞龙院（掌理御殿）、磨勘司（掌官吏考核）、文思院（掌御用器物制作）、蕃学与汉学（学校）。这些机关的长官由蕃、汉人担任。此外，另设有只限于蕃人（主要是党项人）充任的官职，有宁令、谟宁令、丁卢、素贲、祖儒、吕则、枢铭等。夏国的官制，基本上仍是蕃汉并行，实行蕃汉分治。大庆二年（1037）增汉官为十六司，天授礼法延祚二年（1039）又设尚书令，总理十六司政务。文武官员的冠服有严格的等级规定。地方行政编制分州县两级。

军事制度

夏国所有的男子，平时从事农牧业，有战事则接受征发。年十五岁为丁，每两丁征正军一人；另配备随军服杂役的“负贍”一人，合称为一“抄”。初以四丁为两抄，合住一帐幕。后改三丁同住一帐幕，即二正丁合用一负贍。兵丁自备弓矢甲胄，自带粮草。正军每人官给马、驼各一，如有倒毙需予赔偿，称“长生马驼”。每当发兵时，夏主以银牌召部长面受约束。部落首领各统领本部落兵应召，谓之“一溜”。出征前各部落首领刺血设盟，由夏国主率领他们一道进行射猎，将猎获的野兽环坐共食，席上让他们各自发表征战意见。国王择善而从，布置行军作战任务。全境分为左右两厢，各军驻地设置监军司，由都统军、监军使等统率。总计可征兵额五十余万。

在中央，元昊选豪族子弟五千人组成侍卫军，号“御围内六班直”，分三番宿卫。这支宿卫军同时也是一支质子军，通过它加强了夏王廷对各部落豪族的控制。此外还设有号为“铁鹞子”的骑兵和叫做“泼喜”的炮手，是具有熟练技术的特殊兵种，其职责主要是充任禁卫。

刑法制度

夏国“蕃族有和断官，择气直舌辩者为这，以听讼之曲直，杀人者，纳命价百二

十千”。骨勒茂才所撰《番汉合时掌中珠》里，记载其刑事诉讼的程序是：官府接到诉状后，把犯人枷禁在监狱中，并进行查证；如拒不招认，便用严刑拷打，逼使“伏罪入状”。伤人致死要赔偿死者的命价。夏国的法律，一部分当是来源于党项部族沿行的习惯法，另一部分则是杂采宋、辽的条法、制度。仁宗在位时期编行的《天盛年改定新律》，便是一部仿照宋朝政书编修的夏国政治制度和法令的汇编。它是据前代所发布的律令增补、修订而成的。

四、西夏的经济状况

党项族在唐末、五代时期，奴隶制有了很大发展。西夏景宗李元昊建国称帝，从奴隶制转化为早时期封建制，即领主封建制。11、12世纪之交崇宗统治时期，转变为更加成熟的地主封建制。

土地占有状况

夏国的土地占有制，大体上有以下几种形式。

国有或皇室 所有皇帝代表国家直接掌握规模庞大的“御庄”和其他广大的闲田旷土，具有国有性质。河渠、水利也主要掌握在国家手中。

贵族和官僚所有党项贵族首领都占有大量土地，它一部分来源于原部族所有的土地，一部分是皇帝的赐予。贵族官僚们也多乘势豪夺。一些汉人士子、吐蕃首领与回鹘上层人物被夏国授予官职，也因此获得一定份额的土地。愈到后来，官僚占地的数量就愈大。

寺院所有 夏国崇佛。境内寺庙林立。上层僧侣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起着特殊的作用，成为统治者有力的助手。寺庙从夏廷得到丰厚的布施，拥有大量土地，并开设质房，发放高利贷。

农牧民小土地所有 在夏、宋邻接的沿边地带居住的“蕃部”和“属羌”，常有将土地买卖及抵押的事实。夏国存在有个体小农牧民以至中小的庶民地主或牧主。西夏仁宗时修订的《天盛年改定新律》规定：生荒地归开垦者所有，其本人和族人可永远占有，并有权出卖。这证明农牧民的小土地所有制是得到法律承认的。

农业和畜牧业

党项人原来主要从事畜牧业。李继迁提倡垦殖，兴修水利，使境内农业生产有所发展。李德明统治时期，国内相对安定，农业出现兴盛局面。夏国的主要农产区，除东部的横山，西部的天都、马衔山一带外，还有兴庆府、西庆府，甘、凉诸州之地。这些地区土宜种植，特别是兴庆府、西平府地区有良好的水利条件，历代所开凿的大小水渠甚多。景宗李元昊又兴修了从今青铜峡至平罗的水利工程。世称“吴王渠”或“李王渠”。因此，这一带成为夏国粮食生产的主要基地。河西、陇右地区历来是著名的牧区，但也有相当发达的农业。甘、凉两州利用祁连山的融雪水灌溉。夏国在许多地区都有所谓“御仓”的设置，大量收储粮食。

夏国的农业生产和农产品种，基本上与汉族地区相同。粮食作物有麦、大麦、荞麦、青稞、糜粟、稻、豌豆、黑豆、毕豆等。蔬菜有芥菜、香菜、蔓菁、萝卜、茄子、胡萝卜、葱、蒜、韭菜等。水果、药材也有栽培。耕作农具有铧犁、镰、锄、锹、碌碡、子耧、耙、耨坎（坎）等。牛耕已普遍采用。从事农耕的多是汉人，但也有一部分从事畜牧的党项人开始转事农耕。



党项、吐蕃和回鹘人则以畜牧业为主，横山以北和河西走廊地带是良好的牧场。牲畜品种以羊、马、牛、驼为主，还有驴、骡、猪等。国家设有群牧司以管理畜牧，官营的畜牧业是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

手工业

手工业 主要由官府控制工匠生产。夏国设有文思院、工艺院以及金工司、绢织院、铁工院、木工院、造纸院、砖瓦院、出车院等机构，管理各种手工业生产，为王家服务。

毛纺织业夏国毛皮原料丰富，毛纺织业发达。产品有氍毹、毛布、毡、毯等，它们是党项人制作帐幕、衣服、被单、帽、鞋、袜等的原料，也是对外交易的重要物资。

冶铁和金属制造业 景宗在夏州东境曾置冶铁务，管领铁矿的开采和冶炼。现存安西榆林窟的西夏壁画中有锻铁图，图中二人持锤锻铁，一人在竖式的风箱后鼓风。1976年在夏王陵区出土的鎏金铜牛，形体硕大，重达一百八十八公斤，形态逼真，显示了当时高超的冶铸工艺水平。

兵器制造业 夏国统治者十分重视兵器制造。景宗曾在其官厅东厢后设有锻造作坊。兵器的种类有弓箭、枪、剑、铍、钺、斤、斧、刀等，工巧质优。铠甲片采用冷锻工艺制造，坚滑晶莹，非一般箭弩所能射透。夏国铸造的剑有“天下第一”的美誉。但因金属资源贫乏，无法自给，常遣使赴宋购买兵器；或者将购到的铁就地打造，再运回本国。

陶瓷业 灵武县发现的夏国瓷器，器壁很薄，瓷胎呈灰白色，胎质欠细腻，有的成型不规整，釉为白色，但不稳定，器表下部及圈足部分都不挂釉，器底有砂痕，其质量显然不能与宋瓷相比。在内蒙古伊金霍洛旗发现的酱褐色釉剔花瓶，瓶身上刻有牡丹花纹画式，其形制与花式凝重大方，是夏国瓷器的精品。

雕版印刷业 夏国从宋、金输入大量汉文典籍。金平阳的印本在夏国销行。夏国刻印书籍，以佛经为多。现存的印本书籍有崇宗正德六年(1132)刻行的《音同》，仁宗乾祐二十一年(1190)刊行的《番汉合时掌中珠》、桓宗天庆七年(1200)雕印的《密咒圆因往生集》等。乾祐二十年，仁宗就大度民寺作大法会，一次就散施刻印的夏、汉文《观弥勒上升兜率天经》十万卷，汉文《金刚普贤行愿经》、《观音经》等五万卷。佛经之外，还刻印诗、文、小说、谚语、文字、音韵、法律、医术、日历、卜筮、咒文等书籍，以及大量以西夏文翻译的汉籍，包括儒家经籍、诸子、史传、兵书、医书以及版画等等。政府设有“刻字司”，作为官家的出版机构。

商业和贸易

夏国前期，主要是与宋朝；后期则为金国。夏与宋、金间的贸易，主要采取以下几种方式。

在双方边境设立榷场，进行大宗货物交易 宋朝利用开闭榷场贸易，对夏方进行牵制，以期达到安边绥远的政治效果。

和市 在沿边开设小规模榷场，主要用于满足双方边民日常生活的需要。宋朝在河东路、陕西路的久良津、吴堡、银星、金汤、白豹、虾麻、折姜等地都辟有和市。如1002年，李继迁所部在赤沙川、囊驼口各置“会”贸易。“会”是一种定期的集市。

通过贡使进行贸易 夏国的使节每年按规定到开封输贡，宋朝政府除优予回赐外，还听任使者在京自便贸易。这种贸易往往规模甚大，获利甚丰。夏与辽也通过贡使进

行贸易。上京临潢驿、中京来宾馆都设有接待夏使的处所。夏使入境,允许沿途私相贸易。后期夏、金的贸易中,夏使进入金境便同富商交易,到达中都后留都亭贸易。

夏国从宋、金取得的商品主要为缁、帛、罗、绮、香药、瓷器、漆器、姜、桂等。茶叶是夏国最感兴趣的商品。它除了供夏人消费之外,还用来与西北邻部交易,牟取厚利。夏国也图多方贸易铁制品,但辽、金都严禁铁器外流。夏国的输出品有羊、马、牛、骆驼、盐、玉、毡毯、甘草、蜜、蜡、麝香、毛褐、獐羚角、硝砂、柴胡、苁蓉、大黄、红花、翎毛等。其中以牲畜、毛皮制品和毛纺织品为大宗。盐州一带所产的青盐,品质纯净,略带青绿色。早在夏国建国之前,当地人民从盐湖中取得盐粒,运往关中,供应内地人民的需要,再购回粮食等生产必需物品。其后,夏国垄断盐产,成为重要的财政收入,强求宋朝政府收购,以换取物资。宋朝为了保障解盐(解州所产)的专卖利益,总是加以拒绝,并严禁私贩入境。但因为青盐价低而质优,走私之风无法禁绝,私贩的数量且相当巨大。药材中,夏国所产的大黄最负盛名,商人远贩到各地。夏国地处中国与中亚地区往来的要道。它从回鹘或中亚商人那里抽取实物或承买转卖,从中获取厚利。为了便利交通,夏国修筑驿道,通贯全境。东西二十五驿,南北十驿,从兴庆府东北行十二驿可至契丹。驿道的兴修便利了商业的发展。

五、西夏的宗教和文化

宗教

党项人原崇信鬼神和自然物,巫术流行。西夏建国以后,大力提倡佛教,李德明和西夏景宗都通晓佛学,多次从宋朝请来《大藏经》。此后,以西夏文翻译了大量佛经。夏国境内庙宇遍布。景宗在兴庆府东建高台寺,鸣沙洲建大佛寺。西夏毅宗的生母没藏氏曾出家为尼,在兴庆府戒坛寺受戒。她修建了承天寺,前后役使民兵达数万人。西夏崇宗在天祐民安五年(1094)重修凉州的护国寺感应塔,后又在甘州兴建崇庆寺和卧佛寺。在夏国后期官署中设有僧众功德司、出家功德司、护法功德司,位居次品(即五品中的第二级)。有不少高昌(今新疆吐鲁番)的大乘高僧来到夏国宣教,他们都有颇高的佛学造诣,权势甚盛。

约自景宗时起,喇嘛教在夏国已见流行,朝中达官有的便是喇嘛教徒,后期影响更加扩大。天盛十一年(1159),吐蕃迦马迦举系教派初祖都松钦巴建立粗布寺,西夏仁宗遣使入藏奉迎。都松钦巴派他的大弟子格西藏琐布带着经像随使者来到夏国,仁宗尊礼他为上师,大规模翻译佛经。

夏国也流行道教。景宗的太子宁明从定仙山道士路修篁学辟谷法,丧命。大安七年(1081)宋军对夏大举进攻,夏人散逃,西平府城里留下僧道数百人。据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述夏国地区除偶像教徒外,还有景教(基督教聂思脱里派)及伊斯兰教教徒。

夏人笃信巫术,称巫师为“厮乩”,或音译为“厮也”。出兵作战时,总要求巫师卜问吉凶。

学术文化

李继迁、李德明两代是夏国学术文化的发轫时期。西夏景宗建国,经西夏毅宗、惠宗两代,文物渐趋兴盛;及至崇宗、仁宗之世,汉文化影响日益深广。夏国统治者多喜爱汉文化,大量翻译汉文典籍,或依据汉籍编译书籍。夏国涌现出一批对汉文化颇有造诣的学者、文士,如儒学学者斡道冲,诗人濮王仁忠,撰修夏国《实录》的焦景



颜、王金，编纂《番汉合时掌中珠》的骨勒茂才，写作《夏国谱》的罗世昌等。

文学艺术

夏国的文士多有诗词之作。一些通俗的劝世行善作品，也常采用诗体形式。宋词人柳永的作品在夏国广泛流行。大德五年(1139)，夏国攻占府州(今陕西府谷)时，崇宗亲作《灵芝歌》，与濮王仁忠相唱和。诗篇的石刻曾保存在兴庆府的孔庙里。佛教艺术在夏国有较突出的发展。现存的夏文物中，佛画以佛、菩萨的画像为多，画风精致巧丽，与敦煌艺术有着某些共同点；在姿态容貌的表现手法上，则与吐蕃画风相似。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和安西榆林窟等处都保存有夏国时期的艺术作品。榆林窟第一窟内的夏国“水月观音”壁画，是造型艺术中的杰作。榆林窟内还有一些反映夏国人民生活状况的壁画，如《打铁图》、《酿酒图》、《农耕图》等。党项人早期使用的乐器有琵琶、箫、笛等，以击缶为节。羌笛悠扬清越，最为流行。党项人也十分喜爱汉族歌曲。宋沈括有“万里羌人尽汉歌”句。唐僖宗曾赏给拓跋思恭一部鼓吹乐(即军乐)，这是夏人有完整乐队的开始。景宗时，汉族音乐在夏国仍有相当的影响。大庆五年(1148)，夏国乐官李元儒曾参酌汉人乐书(歌谱集)更定音律。哈拉浩特出土了《刘知远诸宫调》残本，说明金朝汉人的说唱艺术也传到夏国。

建筑雕塑

党项人多住毡帐。定居的屋室，只有有官爵者才得覆瓦。建国前后，大批汉人工匠来到夏国与党项工匠一起，修建了宫殿寺庙。皇帝陵墓也具有很大的规模。1972年清理的夏王陵八号陵(它被推断是夏神宗遵项的陵墓)由阙、碑亭、月城、内城、献殿、灵台、内神墙、外神墙、角台等建筑组成。它们沿中轴线左右对称展开，严格地遵从了唐、宋建筑的格式，但也显示了党项的某些民族特点及其他民族葬俗的影响。现存天祐垂圣元年(1050)建造的承天寺塔(在今宁夏银川)和天祐民安五年(1094)重修的凉州护国寺感应塔(在今甘肃武陵)，虽经后世重修，仍现当时建筑的宏伟。

甘州卧佛寺的大卧佛，体形魁梧，仪态庄严，是雕像中的杰作。夏王陵区出土的石马，通体圆雕，神态生动。王陵碑亭遗址发现的石雕人像的造型奇特，线条粗壮，面部和肢体都突出地表现出强力感。在同一地区发现的已残损的竹雕上，有庭院、松树、假山、花卉和人物，布置适宜，形态优美。

历法和医药

党项人中，沿袭古代北方民族的习惯，以十二生肖纪年；藏历对他们有着明显的影响。宋朝每年要向夏国颁发新历，在夏国行用。西夏建国前，党项人患病，便延请巫师驱鬼，或把患者迁避到另一间房内，以图躲避灾祸，叫作“闪病”。西夏建国以后，《千金方》、《神农本草》等汉人医书传入夏国。夏国统治者还多次向金朝请求医药。1971年在甘肃武威发现的西夏文药方残页里，有治疗伤寒病的药方，药物有牛膝、椒、米等，明显地反映了汉族医药的影响。

婚姻丧葬

党项人从隋唐以来，盛行收继婚制，允许聚庶母、伯叔母、兄嫂、子弟妇，只是不娶同姓。富有家庭的男性家长可以收养众多的妇女，实行多妻制。党项人旧俗，死则焚尸，名为火葬。西夏建国以后，皇室、贵族多改行土葬，并仿汉人制度修建豪华的陵墓。

第五章

元

第一节

成吉思汗创基立业

一、英雄出世

在中国封建王朝的更迭史上，代宋而起，统一中国的，是由蒙古统治者建立的元王朝。蒙古统治者在实现对中国的统治之前，已经先在漠北高原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政权——大蒙古国。创建这一伟大功业的杰出人物，就是“一代天骄”的成吉思汗。后来，成吉思汗的后嗣者们不断通过征服战争，于1234年灭亡金朝，实现对中国北部的统治；于1260年将政治中心南移，定燕京(今北京)为中都，后改为大都；于1271年改国号为大元，于1276年灭亡南宋，统一中国。此后，又传九代，于1368年，被朱元璋的明军所推翻。本卷所述元王朝的兴亡史，从时间断限上说，叙述的就是自成吉思汗建国迄至元顺帝退出中原的历史(1206—1368年)。

成吉思汗出生于蒙古高原。蒙古高原是自秦汉以来，我国北方民族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鹘、黠戛斯等部相继在这里称雄之地。根据学术界目前占主导的意见，最早的蒙古人来源于东胡。《旧唐书》所载望建河(今额尔古纳河)之东的蒙兀部，就是从室韦部落发展而来的。而蒙兀即蒙古的唐代汉文译名。因此，蒙古族的最近族源，便是来自室韦蒙兀。

《元史·太祖纪》在记载成吉思汗的生平事迹时说：“太祖法天启运圣武皇帝，讳铁木真，好奇渥温氏，蒙古部人。”

“奇渥温”，是蒙古部族“乞颜”的异译，复数是“乞牙惕”。太祖的部众都是“奇渥温”，因此，它不是氏，而是部名。汉族有姓，少数民族称氏。太祖的氏源自十世祖孛端察儿。据蒙文史籍《元朝秘史》(蒙文名《忙豁仑·纽察·脱卜察安》，又作《蒙古秘史》)载，孛端察儿为“孛儿只斤”氏。这样，成吉思汗就应该是蒙古乞颜部孛儿只斤氏族的人了。

成吉思汗的父亲名也速该，是该部族中一个受人尊重的把阿秃儿(勇士)，并当上了他先辈所统部落的“统治者和首领”。公元1162年，正当他率部攻打世仇塔塔儿部凯旋而归的时候，适遇长妻诃额伦生育长子。为纪念这一次的武功，他以这次战争中一个俘虏的首领的名字为其子命名，叫做铁木真。这个新生的婴儿铁木真，就是日后创建蒙古帝国，名震世界的成吉思汗。

铁木真出生时，蒙古高原正处于一个大变动的前夜，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幅四分五裂、混乱征战的局面。在从五代到成吉思汗统一漠北期间，即在公元十世纪至十



二世纪之间，大漠南北的广大地区（约当今贝加尔湖以南，长城以北，阿尔泰山以东，兴安岭以西），分布着彼此不相统率的大小部落。这些部落，既有操蒙古语的，也有操突厥语的；既有从事游猎经济的，也有从事采集经济的。这些部落之间发展水平极不一致，甚至分别属于不同的经济文化类型和不同的语族。它们大多处在氏族社会后期的不同阶段，并逐步由原始社会跨进阶级社会的门槛。随着生产力的不断进步和外部影响的促进，这些部落的氏族制度开始瓦解，出现了私有财产和阶级分化。旧的秩序失去了效力，部落社会进入了不可自拔的危机之中。新兴的游牧贵族，为了掠夺更多的奴隶、牲畜、良马、美女和富饶的牧地，为了保持既得的权力，并攫取更大的权力，不仅在部落之间，而且在部落内部，进行着无休止的战争和相互的倾轧与残杀。加之女真统治者为了阻止这一地区各部落的发展，对它们采取了分化政策，制造相互间的仇恨，这样就更加剧了这一地区的长期混乱和危机。

《元朝秘史》生动地记述了当时各部落间以及部落内部发生的一系列冲突和战争，以致它被人们认为是当时社会所“发生的黑暗事件的‘秘密’资料”。它描写道：

“星空团团转旋，

各部纷纷作乱。

谁能在床上安睡！

都去劫掠财源。

大地滚滚腾翻，

天下到处作乱。

谁能在被窝里安睡！

人们相杀相残。”

十三世纪的伊朗史家志费尼也描写道：

“成吉思汗出现前，他们没有首领或君王。每一部落或两部落分散生活；彼此没有联合起来，其中时时发生战斗和冲突。他们有些人把抢劫、暴行、淫猥和酒色看成英勇和高尚的行为。契丹汗（指金朝皇帝——引者）经常向他们强征硬索财物。他们穿的是狗皮和鼠皮，吃的是这些动物的肉和其他死去的东西……他们过着这种贫穷、困苦、不幸的日子。”

正是在这个外有强敌金兵压境，内有各部落、氏族互相吞并，无休止的战争和残杀把漠北诸部人民推进贫困、灾难和死亡深渊的时代里，产生了这样一种客观的历史要求：谁能统一诸部，制止掠夺和残杀，结束混乱和无序的状态，谁就会赢得人民的拥护，谁就能成为顺应时代发展、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人物。

二、统一漠北

铁木真之所以能在这个历史使命面前应运而生，最终成为统一漠北、振兴蒙古的伟大人物，固然是社会时代创造出来的。但社会时代之所以选择他，而不是选择别人，这却与铁木真个人的经历与奋斗分不开。

如果把铁木真从九岁丧父，直至三十六年后（公元1206年）登上大汗宝座的奋斗业绩分段叙述，可以看出他步入成功的奥秘：

（一）在逆境中成长

据《元朝秘史》记述，铁木真九岁那年，他的父亲也速该带着他去弘吉剌部相亲。

他被留在弘吉剌部，而他的父亲则在返程的路上，误吃了塔塔儿部人放了毒药的酒饭，乃至赶到家中，病势已很沉重。也速该仓猝地托孤于察合老人的儿子蒙力克就死了。也速该死后，只剩下妻子诃额仑及铁木真兄弟。孤儿寡母，他们完全丧失了原有的政治经济地位。早就忌恨也速该权力和威望的泰赤乌氏贵族，乘部众无主之时，不仅夺走了原属于也速该的部众，而且还经常欺侮他们，甚至把诃额仑和她的幼子们一起遗弃于营盘。为了养活幼子，不甘向命运屈服的诃额仑，只得“穿着百结的衣服，扎着破乱的裙子”，靠着拾果子，掘草根过日子，沿斡难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鄂嫩河）放牧，在艰难困苦中生活。诃额仑还时常教育孩子，训练、培养他们吃苦耐劳和团结奋斗的精神。一次，铁木真在斡难河钓鱼，鱼被异母兄弟别克帖儿夺去。铁木真顿时大怒，即与二弟合撒儿暗中将别克帖儿射死。他母亲诃额仑知道后，痛心地教训他们说：“你们是一个父亲的儿子，为什么这样做？现在，你们也知道除了影子，没有旁的朋友；除了尾巴，没有旁的鞭子吧？如果这样，我们怎么能够向泰亦赤兀惕人报仇呢？”此后，铁木真还经受了一连串打击对他的考验与磨练。当泰赤乌贵族知道铁木真母子仍然坚强地活着，余恨未消，便想对铁木真下毒手。铁木真勇敢机智，逃脱泰赤乌贵族的追捕，曾在森林中躲了九天，但仍未得免。泰赤乌贵族捉住铁木真，让他带枷示众，待他如同俘囚。乘着四月中旬清明节的宴会，铁木真乘机用枷击倒看守，跳进斡难河边的水沟里，得以脱险归来。接着，又遭偷马人的欺负，把他家仅有的八匹骗马骑走。铁木真成年后，还遭到过一次重大打击。一天清晨，势力复盛的篾儿乞三个分族首领之一的脱脱，突然率领三百骑偷袭铁木真。铁木真全家仓猝逃散，他的妻子孛儿帖和庶母，均在这次遭到掳劫。人生道路上的种种磨难、挫折和打击，不仅没有压垮铁木真，反而使他变得更加坚强和成熟起来。后来，在成吉思汗的奋斗历程上，无论是在胜利、得意，也无论是在失败、危难的时候，他都始终充满一种坚强不屈、百折不挠的精神。这种精神应该说是从他少年时代的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就铸成了的。

（二）在团结中壮大

在当时那个以强凌弱、以众暴寡的时代里，仅靠个人的单枪匹马是很难战胜仇敌，重新恢复家业的。饱经忧患的铁木真，自幼就尝够了“除了影子，没有旁的朋友；除了尾巴，没有旁的鞭子”的苦头，深深懂得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只有从团结中才能获得战敌取胜的力量源泉的道理。他曾经比喻说：“一支脆弱的箭，当它成倍地增加，得到别的箭的支持，哪怕大力士也折不断它，对它束手无策。”为此，他时时不间断地在族人中播下团结的种子，寻求可以互相帮助的朋友和力量。

铁木真在聚集个人力量的过程中，首先从利用他父亲的老关系开始做起。克烈部的首领王罕，是他父亲的安答（契交，好朋友），这时声势甚壮。为了寻求他的庇护和帮助，铁木真尊敬他像“亲生父亲一样”，见面时毕恭毕敬地送给他一件珍贵的黑貂裘衣，由此换来王罕的欢心。王罕不仅答应帮他把离散的部众聚集起来；而且，还主动联络蒙古札只剌部首领札木合，一起出兵打败脱脱，帮铁木真夺回了孛儿帖，报了失妻之仇。

与此同时，铁木真努力团结一批效忠于他的那可儿（伴当），作为自己事业的支柱。铁木真英明有为，忠心事友，患难与共，声势大振。一时间慕名前来归附的人越来越多，他逐渐成为众望所归的人物。自动投效铁木真的人中，不仅有出身低微的弱小氏族的奴隶和属民，也有举足轻重的实力雄厚的贵族；不仅有属于乞颜部、孛儿只斤部的，也有属于邻部外族的。在这一过程中，一些颇具军事才能的人，逐渐聚集在铁木



真的身边，如铁木真的两个弟弟合撒儿与别勒古台，“四杰”之一的博尔术，“四狗”之一的者勒蔑、忽不来、速不台，后来均成为辅佐成吉思汗开创基业的得力干将。在铁木真搜罗的人才中，还有一个萨满教（蒙古族的原始宗教）的巫师豁尔赤，他不仅带来了巴阿邻氏的若干部落之一，而且还利用他的特殊身份，当众宣传神的启示，说天意要大家离开札木合，拥戴铁木真当国主。铁木真也当众许诺，若他当了国主，一定封豁尔赤当万户那颜（贵族）。

随着铁木真的“功德日盛”，部众日强，他逐渐脱离了对王罕和札木合的依附，开始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这时，人们也从铁木真的“功德”和“宽仁”中看到了希望。他们急于要拥戴他当新的领袖，以便能在他的带领下建功立业，享受荣华富贵。大约在1189年（金大定二十九年），有资格参加选汗会议的贵族首领阿勒壇、忽察儿、撒察别乞等集合二十六首领，共推铁木真为蒙古本部可汗。他们向铁木真效忠说，你当了可汗，我们杀敌走在前头，掳来的美女骏马奉送给你，出外打猎，把获得的野兽奉送给你。他们还保证作战时听他的号令，如有违犯“你可以撇弃我们的妻女，没收我们的财物，把我们的头颅抛在荒郊野外”；平时如不奉行他的命令“你可以收去我们的属民，夺去我们的子女，把我们的身体，抛在无人烟的地方”。铁木真满心欢喜地接受众人的拥戴，作为回报，他当众宣布，你们“久后都是我吉庆的伴当”。这样，通过新汗同他臣属们的互相誓约，铁木真终于成为蒙古乞颜部落的新领袖。

（三）在征战中强盛

铁木真的崛起，引起了他的世仇和邻近部落的不安和恐慌。这些部落的首领出于自身利益，无不对他虎视眈眈，从而构成了对他生存发展的现实的和潜在的威胁。在当时社会还视战争为荣耀和一种劳动形式的发展阶段上，战争不仅是保卫自己生存，谋求进一步发展的手段，而且也是廓清统一障碍，结束漠北高原的混乱纷争局面的必由之路。铁木真正是适应历史的这一要求，在称汗后的十七年（1189—1206年）间，通过向周围邻近部落进行一系列战争，使蒙古乞颜部迅速壮大强盛，进而成为统一漠北的中坚力量。

十三翼之战。对手是札只剌部的札木合。札木合志在称雄朔漠，对铁木真作乞颜部领袖心生忌恨。于是他集结包括泰赤乌、塔塔儿等部在内的十三个部落，约三万人，潜师来袭。铁木真羽翼未丰，初逢大敌，为避开强敌，在初战失利后，即主动退守斡难河畔自保。此战后，归附札木合的诸人、诸部，因不堪其暴虐，纷纷离散。铁木真趁机抚绥诸部，引来诸部主动投效。这样，铁木真的实力比战前更加壮大了。加之他这时曲意与王罕交欢，互为声援，由此在大漠南北，形成了由他与王罕和札木合三大势力鼎足而立的局面。

攻打塔塔儿。塔塔儿是铁木真的世仇，无疑当在征讨之列。1196年，时机终于来了。这年金丞相完颜襄统兵攻打塔塔儿，铁木真遂乘机联合王罕，配合金兵夹击塔塔儿。大败塔塔儿部后，铁木真获得金朝“札兀惕忽里”（诸部落首领）的封号，从而有利于提高他在蒙古诸部中的地位和声望。

阔亦田决战。1201年，札木合结集弘吉剌、塔塔儿等十一部，兴师西袭铁木真。铁木真集合精锐迎战于海剌儿阿带亦儿浑，败之。弘吉剌等部来降。1202年，札木合复搜罗蔑儿乞、泰赤乌、塔塔儿等部进攻铁木真，兵势甚张。铁木真力不能支，乃乞援于王罕。两人合兵共拒札木合，战于阔亦田，风雪大作，札木合大败，从此一蹶不振。

铁木真乘胜出兵消灭塔塔儿部。至此，在大漠南北形成铁木真与王罕对峙的局面。

消灭王罕。铁木真与王罕的联合只是表面的和暂时的，双方早就怨恨既深，彼此绝裂势所难免。1203年，王罕率军进袭铁木真于金界壕附近的驻地。铁木真仓促应战，部伍溃散，仅带着十九骑落荒而逃。铁木真为缓和兵势，主动与王罕保持联系，暗中约集力量，计划从王罕内部突破。后来，铁木真终于选准时机，利用王罕的无备和内部发生分裂，突然率军偷袭王罕的驻地。王罕的主力部队不能抵抗，很快溃降。王罕仓皇出逃，在乃蛮边界被守将所杀。至是，大漠南北，除乃蛮外，均已臣服于蒙古。

消灭乃蛮部。乃蛮部自恃“国土广大，百姓众多”，长期与铁木真作对。1204年，铁木真先发制人，主动出击，设疑兵令其惊惧。乃蛮部军心涣散，仓猝应战，一触即溃，遭到大败。其首领太阳罕势穷被擒杀，该部遂降。至此，铁木真终于赢得了统一诸部战争的最后胜利。

铁木真之所以能够从小到大，由弱到强，最终取得称雄漠北的胜利，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以战争手段保卫家族生存，征服漠北诸部的事业，顺应了历史进步的趋势和要求，符合了广大人民要求统一的利益和愿望，有利于结束漠北草原长期分裂混战的局面，摆脱黑暗落后的氏族部落统治，因此，它能最大限度地赢得人心和支持。同时，他能知人善任，以忠诚信义作为处理内部关系的原则，以那可儿集团为骨干，建立了一支忠诚可靠、遵守纪律、团结一致的强大的武装力量，这是铁木真夺取一连串军事胜利的基础。伊朗史家志费尼称赞说，在历史上，在文献记载中，还从未见过中国“任何王朝的帝王拥有像鞑靼这样的军队”。就是在整个世界上，也很难“有什么军队能够跟蒙古军相匹敌”。作为这支军队的统帅，铁木真英勇有谋略，在指挥作战中，表现了高超的军事艺术和天才。如他善于在战争中利用矛盾，巧妙地运用各个击破的策略，争取、联合暂时的同盟者，孤立、消灭最主要的敌人。善于针对不同敌情，创造性地制定一些符合战争规律，以小制大，以弱胜强的战略战术，经常采用的战术有：歼灭战、闪击战、迂回战、运动战、无后方作战，以及骑队围突、箭骑协同、性搅敌阵、迷惑、诱伏、疲劳、奇袭等等，这也是铁木真获得成功的奥秘之一。

三、蒙古建国

铁木真既已扫平漠北，成为拥有漠北草原诸部的强有力的领袖，下一步便是采用国家形式把这一统一局面固定下来，并变实际上的领袖为合法的君主。

1206年(丙寅岁，宋开禧二年，金泰和六年)，铁木真在斡难河的源头，召集诸部落首领举行忽里勒台。忽里勒台原是部落议事会议，这时开始演变为选汗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各部落首领根据一个“惯于揭示玄机、预言未来”的萨满教巫师阔阔出，从“神”那里得到旨意，说该给铁木真命名为“成吉思汗”，于是会议决定上铁木真为“成吉思汗”的尊号。

“成吉思汗”的意义，古今中外向来有着不同的解释。在理解“成吉思”称号的含义时，有坚强、海洋、最大、天子等多种说法，总之都认为这是一个有崇高意义的称号。近年有的论者还从这一称号产生的历史根据、社会背景，以及北方民族与中原的对比联系中考察，认为“成吉思汗”就是天皇帝或天可汗之意。它与匈奴所称的天单于，突厥、回纥所称的天可汗或登里可汗，唐朝皇帝所称的“皇帝天可汗”或天可汗，辽代君主所称的天皇帝或天皇帝，都是彼此相互印证，遥相呼应的。由此也证明蒙古



族和中原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是源远流长的。

部落大会上竖起了象征这个统一的国家政权的旗帜——“九足白旄纛”，这是一种悬有九尾的大旗。在突厥人和蒙古人中，数字“九”具有象征意义，常表示献赠礼物的最大数目。旗帜之所以取白色，因为蒙古习俗“尚白，以白为吉”。这个新建立的国家叫做“也客·蒙古·兀鲁思”，即大蒙古国。此前，分布在大漠南北的大小各部族都各有自己的名称，蒙古部只是其中之一。至此，蒙古便成为各部族的共同名称。不但各部族统称为蒙古，而且全体人民也自称为蒙古人。

铁木真当了大汗后，第一件事就是大封功臣。成吉思汗根据论功行赏的原则，对辅佐他的事业有功劳的臣属们，加以高官厚赏。在选汗大会上，经他封赐的，就有开国功臣蒙力克、博尔术、木华黎、豁儿赤等九十五个千户。由于当时“太祖起自朔土，统有其众，部落野处，非有城郭之制；国俗淳厚，非有庶事之繁”。因此，他在封赏功臣的官职时，皆从漠北草原的传统风俗和简朴的庶务需要出发，其官位和职事与中原不同，丝毫没有模仿汉人官制的痕迹。例如，在封赏的文臣中，失吉忽秃忽为总断事官，享受像成吉思汗亲兄弟的分子；蒙力克辅佐有功，为纪念他的功劳，准允他议事时“坐在贵座上”，给他的奖赏，直至其子孙，“永远不绝”。在武将中，忽必来等“四狗”，是成吉思汗的“像猛狗似的忠实同伴”，他因此被指定“总管全军事务”；木华黎平定国内，出力居多，他被封为“国王”，让其“坐在众人之上”；主儿扯歹在奇袭王罕的战斗中当先锋，建了殊勋，成吉思汗为了报答他的丰功伟绩，在封给他高官的同时，还把他的一个夫人亦巴合赐给主儿扯歹。

成吉思汗在大封功臣的过程中，同时就建立了一个简单的中央政府。从国家机器职能分析，初建的蒙古国中央政府由以下四部分组成：

（一）千户制

千户制既是军事组织单位，也是地方行政管理单位。这一制度初行于成吉思汗统一漠北诸部的过程中。随着被征服各部并入蒙古部，为了便于管理这些部众，便将他们分散编制到蒙古各千户的管辖之下。成吉思汗立国后，又将所有部族的部众，分散编制到九十五个千户的管辖之下。规定：每十户设一个十户长，每百户设一个百户长，每千户设一个千户长，由下到上，层层隶属。千户之上，分设左、右两翼万户长，以木华黎和博尔术分领之。这样，所有民众便统统被纳入成吉思汗的直接控制之下。这一军、政合一，兵、民合一的制度，对当时人口稀少，战事频繁的国家政权的存在和发展，起了十分有效的维护作用。由于此后蒙古国家是按千户来征集军队、编制民户和组织战斗的，因此，这一制度也就成为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用以对外进行掠夺扩张的组织基础。

（二）怯薛制

怯薛即护卫军，源起于氏族社会崩溃过程中出现的伴当（那可儿）。在成吉思汗称雄漠北的过程中，曾两次扩大他的侍卫队伍。1206年，为了适应长期战争和拱卫统一国家的需要，又对护卫军进行第三次扩弃，建立了一支包括一千宿卫、一千箭筒士、八千散班在内的共一万人的护卫军。充当护卫的人，都是从千百户及蒙古白身人（平民）子弟中选拔出来。怯薛的执事，主要担任大汗的护卫，怯薛之下所有单位都分为四班轮流值班，故称“四怯薛”，分由四位开国元勋，即“四杰”：博尔忽、博尔术、木华黎、赤老温及其子孙世袭率领。怯薛还分管营帐宫室的各种事务，随着王室分工的细致，他

们的职责也逐渐有所增加。怯薛既是大汗的护卫军，同时也是整个蒙古国家军事力量的核心，通过这一制度，蒙古国家得以建立一支强大精锐的常备军。

（三）札鲁忽赤

札鲁忽赤即断事官，早在蒙古国家正式形成以前，就已经出现了审问斗殴和“盗贼”的札鲁忽赤。据《元史》记载，“国初未有官制，首置断事官曰札鲁忽赤，会决庶务”。断事官掌刑政之属，“国初尝以相臣任之，其名甚重”。断事官在蒙古前期政府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当时断事官的职责，主要是审理词讼，对犯罪者“可杀的杀，可罚的罚”。此外，还担负分配属民、记录法令及作大汗耳目的重要任务。不仅中央有断事官，凡是有分地的诸王、功臣，也都有自己的断事官，以治理分地之民。

（四）必阁赤

必阁赤，即汉语令史，主管文书的官员。蒙古初起朔漠，尚无文书，凡发布命令，遣使往来，传递信息，只能依靠口头传达。1204年，成吉思汗从乃蛮俘虏了掌印的畏兀儿人塔塔统阿，命他以畏兀儿文的字母拼写蒙古语，创立了蒙古文字。此后，蒙古统治者便用这种文字来发布文书。有了文书，自然就需要有主管文书的人，于是这就产生了必阁赤。随着对外扩张的不断进展，为了适应对新征服地区发布文书的需要，后来又陆继吸收了其他民族的知识分子来充当必阁赤，分别掌管各种文字的文书。

除了设立上述四种职能机构外，成吉思汗还委任过兀孙、忽难、阔可搠思、迭该四人管言谏，“凡是听见的，看见的，要毫不保留地对我说”；委任过兀孙为别乞那颜，掌管萨满教事务，“可以穿白袍，骑白马，坐在上座”。这些也应该构成国家职能的一个部分。

四、向外扩张

蒙古立国之前，在中国大地上并存着若干政权。“南方为汉族之宋，北方为汉化的女真之金。宋、金两国之西，又有唐兀建立之西夏国”。再西去是西辽及其臣属下的畏兀儿。南宋之南有大理，西南有吐蕃等等。新兴的蒙古国正是在这种多国并立的政治格局中崛起。刚刚取得统一漠北胜利的成吉思汗，接着又率领蒙古骑兵对外进行扩张，从不停顿地发动了南伐金朝，远征西域和近灭西夏的战争。

以我国北部蒙古为中心的北亚草原地带，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无数游牧民族的移民和对外征服活动，以至成为影响历史进程的动乱摇篮。对于包括匈奴和蒙古族在内的北亚游牧民族，何以在其崛起后都要不时南侵的问题，中外学者曾经从不同角度对它加以探讨。究其原因，无外乎深深植根于他们的经济体系之中，即由游牧经济对农耕社会的倚存和矛盾，所引起的对农耕社会的贸易与掠夺乃至战争。同时，游牧君长对内的政治设想和帝国意识，也是触动他们对外侵略的原因。成吉思汗曾经对他的儿子们说：“世界广大，江河众多。使你们攻占外国，去各自分配，扩大自己的牧地。”他把掠夺他国领土和财富作为自己的职责，因而驱使刚刚统一后的蒙古牧民，随即投身于对外扩张的战争。

（一）南伐金朝

本来，成吉思汗立国后的第一个攻掠目标应当是金朝。但由于在北方游牧民族心目中，金朝毕竟是上邦大国，加上远隔大漠，对金朝情况若明若暗，所以“未敢轻动”，遂改变进攻方向。为减少侧面的牵制，成吉思汗在攻金之前，先于1205、1207、1209



年三征西夏，终于迫使夏主纳女请降。

蒙古与金朝关系正式破裂始于1210年。在这以前，成吉思汗自1196年接受金朝封号后，一直对每年向其纳贡表示不满，并宣称要向金朝报仇。但由于时机还不成熟，故未敢轻举妄动。西夏依附蒙古后，解除了攻金的侧面牵制。在蒙古地区内部，成吉思汗又通过处理蒙力克的儿子阔阔出以萨满教势力，煽惑民众，企图争夺统治权的严重事件，通过追击乃蛮、篾儿乞部的残余势力，以及北征斡亦剌、乞儿吉思等“林中百姓”诸部，进一步巩固了统治，安定了后方，使南伐金朝无后顾之忧。而这时，金朝统治衰敝日甚，已经到了“不治戎备，俗日侈肆，亡可立待”的地步。恰逢此时，金章宗死，懦弱傲慢的卫王允济即皇帝位。成吉思汗对此人早有了解，甚为鄙弃，所以，当1210年他从金朝使臣处得知卫王即位后，便立即向南面吐唾沫说：“我谓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为之耶，何以拜为！”成吉思汗当众羞辱金朝君臣的行动，揭开了蒙、金交恶的历史序幕。

成吉思汗时期南征金朝的战争分两段进行：

一是成吉思汗自将伐金。

1211年春，成吉思汗自将伐金，进入金境，在浹河堡（今河北怀安县东）与金军激战三天，一举击败四十万金军，使金朝的精兵良将几乎在此役全部被歼。接着蒙古军分路攻略了河北、山西的广大地区。1212年，成吉思汗指挥蒙古军进攻金西京（今山西大同），全歼金元帅左都监奥屯襄所部援军。1213年秋，成吉思汗利用金军主力北调辽东，腹地空虚之机，分兵三路横荡金境，一共攻下河北、山西、山东九十余城，所过州县焚掠一空。当时，成吉思汗南下用兵的目的，志在掳掠，无意镇抚。所破城市，掳掠而去，旋取旋弃。蒙古去兵后，这些城市往往复为金人所守。金朝官军为了阻止蒙古的进攻，往往使用“清野计”，强行把庄稼房舍焚毁。这样，经过数年之间的反反复复，便形成了金元之际，华北“房屋焚毁，城郭丘墟”，田野荒芜，一片残破凋敝的景象。

1214年，成吉思汗屯兵金中都（今北京市）城下，金帝完颜珣遣使求和。五月，又将朝廷从中都迁至汴京（今河南开封）。金帝南迁，标志金朝在北方统治的瓦解。于是，“河北、河东、山东郡县尽废”。1215年，成吉思汗指挥蒙古军攻占中都，尽掠中都库藏财宝北归。

二是木华黎代将伐金。

金朝迁汴后，以黄河为界，全力防御，暂时无北顾之忧。中都陷落，使华北局势更加混乱，一批汉人武装趁势而起。成吉思汗北归后，见征服金朝非短期所能奏效，而华北又亟需有专人负责。于是，他先授札八儿为黄河以北、铁门关（居庸关）以南天下都达鲁花赤，与蒙古诸将守中都。1217年秋，又封木华黎为太师、国王、都行省，承制行事，授以经略汉地全权。诏谕说：“太行之北，朕自经略，太行以南，卿其勉之。”

木华黎受命后，以中都为据点，不遗余力地经略华北。他继续奉行成吉思汗制定的利用契丹、女真、汉族地主武装的政策，在五年间（1217—1223年），依靠成吉思汗时降附的石抹明安、王楫、史秉直、王恂、石天应等地主武装，以及招徕的土豪刘伯林、张柔、董俊、严实、张荣等，作为对金作战的重要力量，相继攻拔了金朝七十余城。1223年，木华黎死，河北、山东、山西之境归于蒙古所有。木华黎死后，其子孛鲁继领他的职务，仍然掌握经略汉地的大权。

“西域”一词，约指今甘肃玉门、阳关以西的地方，其范围的大小，随时代而有所

不同。在《元史》上，西域的概念异常模糊，界定不清，是历代西域范围最为广泛的称号。成吉思汗对西域的用兵，始于攻灭西辽和占领天山南路。乃蛮被灭时，太阳汗之子屈出律汗经畏兀儿住地，投奔西辽。元代文献中的畏兀儿，其统治者就是唐代回鹘汗国的后裔，住地在天山以南的哈刺火州（吐鲁番）和以北的别失八里（又作别十八里，旧称北庭，故城在今新疆吉木萨尔境内）一带。1209年，原臣属于西辽的畏兀儿部首领亦都护巴而术阿而忒的斤，奋起杀死西辽统治者设在该地的少监，归附于蒙古。屈出律既在西辽立足，复又篡夺其权，不仅盘踞西辽，而且大肆迫害天山南路的回教徒。1218年，成吉思汗遂派哲别、速不台前往征讨，与屈出律军战于碎叶。屈出律兵败，死之，由是于山南路一带遂归入蒙古版图，蒙古向西扩张的障碍得以廓清。

1219年秋，成吉思汗除留下幼弟铁木哥斡赤斤镇守漠北，委派木华黎专征金朝外，又亲自率领诸子及十余万大军西征花刺子模。花刺子模是中亚古国之一，原位于阿姆河下游。在蒙古立国的同时，国势渐强，国君摩诃末沙（王）兼并邻邦，从西辽统治下迅速崛起，短短几年间，建立起一个包括前苏联中亚地区以及阿富汗、伊朗等地在内的庞大伊斯兰帝国，俨然成为称雄西域各国的盟主。摩诃末沙野心勃勃，既已称雄西域，更欲向东扩张，企图征服中国，创建一个世界帝国。但是，在他的这一狂想还未及实施前，另一个更为强大的对手——蒙古，已经通过支持回教商队贸易的形式，开始把触角伸向花刺子模。1218年春，由成吉思汗派出的一个四百五十人的伊斯兰商队，行至花刺子模边境讹答刺城，被守将指为蒙古间谍，遭到扣押杀害，商货被没收。成吉思汗继又派遣三名使臣前往交涉，也受到非礼对待。一名使臣被杀，两名使臣剃须后被驱逐。成吉思汗闻讯大怒，遂以此为借口，正式出兵西征花刺子模。

成吉思汗亲率大军攻取讹答刺城，相持不下。遂将跟随从征的四个儿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拖雷分为四军，对花刺子模国实行包抄合围。1220年春，成吉思汗率主力攻占不花刺（前苏联布哈拉），进而攻打花刺子模新都撒麻儿干（前苏联撒马尔罕），降之。曾经杀使掠货的边城讹答刺，在这以前也被蒙古军攻陷，旋即被夷为平地。当蒙古军进迫撒麻儿干时，花刺子模国君摩诃末沙远遁，成吉思汗别遣大将哲别、速不台率三万蒙古军穷追不舍。摩诃末沙败亡于里海，其子札阑丁嗣位。札阑丁率军坚持抵抗，蒙古会师攻陷花刺子模旧都玉龙杰赤（前苏联乌尔根奇），屠之。札阑丁四处转战，曾一度在八鲁湾（今阿富汗喀布尔北）挫败追歼的蒙古军。1221年底，成吉思汗追战于申河（印度河），札阑丁力不能支，策马渡河而逃。至此，花刺子模全部沦陷于蒙古。1223年成吉思汗班师，1225年春回到蒙古。在远征花刺子模的同时，成吉思汗为了向位于今伏尔加河和乌拉河之间的钦察部索要世仇蔑儿乞部部长，还遣大将哲别、速不台率军进入南俄，初次战胜了斡罗思诸侯联军。

成吉思汗的这次西征，为建立横跨欧亚的蒙古大帝国奠定了基础。成吉思汗班师后，对于被征服的花刺子模等西域新得疆土，分设达鲁花赤（镇守官），选用新地降臣以治之。同时，按照蒙古旧俗，将其所辖之地分为四份，并分别指定给四个儿子：拖雷按蒙古幼子守业习惯，分得蒙古本土；三子窝阔台分得乃蛮旧疆；二子察合台分得西辽全境；长子术赤获得花刺子模、康里、乞卜察克诸国故地。

西方的强敌既已翦除，下一个打击目标，该轮到屡征不服的对手——西夏了。西夏在蒙古兴起时，因自己地小力弱，不堪与之抗衡，在表面向蒙古请降时，又暗中与金朝往来。1226年，成吉思汗借口西夏拒绝出兵从征西域，接纳仇人，不遣质子，后来